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民国浙江政局研究 (1927—1949)

MINGUO ZHEJIANG ZHENGJIV YANJIU(1927—1949)

袁成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民国浙江政局研究 (1927-1949)

MINGUO ZHEJIANG ZHENGJIV YANJIU(1927-1949)

袁成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浙江政局研究: 1927—1949/袁成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5004 - 6494 - 5

I. 民… II. 袁… III. 政治 - 研究 - 浙江省 -
1927 ~ 1949 IV. D67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5211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官京蕾

责任编辑 韦丽伶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李 萍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77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陈敏尔 巴音朝鲁

李 强 盛昌黎 张 曦

成 员：潘家玮 赵光君 马林云 沈立江

侯靖方 黄旭明 陈仲方 金兴盛

杨建新 俞剑明 陈永昊 万 斌

郑仓元 侯玉琪 徐 辉 胡祖光

许 江 王建满 王永昌 黄坤明

孙文友 徐止平 厉志海 张家盟

蔡 奇 楼阳生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陈永发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

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

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

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前言

中华民国史是一门距离我们最近的断代史，也是一门在历史学中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1949年以后，这个学科从建立到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要编纂《中华民国史》。1956年，国家首次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全国科学发展规划。1971年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再次指示，要编纂、出版《中华民国史》。1972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此项任务下达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在李新先生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室），由此开启了大陆民国史的正式研究。^①但改革开放以前的民国史研究由于受当时特殊政治气候的影响，成就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后，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促使民国史的研究逐渐步入正轨。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高校系统，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民国史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大量民国史资料，并创办了专门的民国史研究期刊。民国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不夸张地说，现在差不多成为断代史中最为热门的学科之一。

^① 杨天石：《进一步发展中华民国史学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2月14日。

民国史不但在国内呈现越来越热的势头，在国外也受到较多的关注，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大学的“亚洲学”、“东方学”或“东亚研究”等研究机构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民国时期，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在中国大陆都得以翻译与出版。国内外或境内外的学术互动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史料的扩充方面都极大地丰富了民国史的整体研究。

中华民国的历史从1912年起到1949年止，总共也不过8年的时间，其中，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这段历史，也就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22年的历史，是民国史研究的重心所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线索，明显呈现了半殖民地化过程、革命化过程、现代化过程的多重变奏。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在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组织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或间接插手，特别是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国的严重政治危机和混乱局面始终存在，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并没有真正废除，因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持续高涨。发生于中国不同地域的历史事件基本上存在着上述共性的东西。另外，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历史虽然可以印证与全国其他各省区历史发展具有的共性，但各地历史发展的进程又存在着很多区域性的差异，过多地强调共性，很容易使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大通史”的叙述有时确实很难全面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对于民国区域史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

开展民国区域史的研究既是历史研究视野与方法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越来越强的区域意识产生的作

用。目前已经有不少省份出版了民国时期的通史和众多的专题研究，国内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或民国史专业的硕士与博士论文中有相当的选题也是集中在民国区域史方面的，至于对民国区域史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更是难以计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很早就对中国的部分省份进行过现代化进程的专题研究和探讨，其研究的视角和范式很受内地学者的推崇，并产生了某种示范的效果。

民国区域史的研究虽然成绩显著，但如果我们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也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从总体上讲，民国时期的区域史研究多数还是停留在一般的“通论”或“志”的层面，有些甚至就是简单地将大通史下的“中国”两个字换成了某某省，在这种地方历史中，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各地基本上相差无几，甚至连历史时期的划分也是一样的。这种区域史很难使我们真正看出各地历史发展的地区差异，用时下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缺乏明显的“问题意识”。如何在区域史的研究中强化“问题”意识，的确成了民国区域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议题。

《民国浙江政局研究》就是旨在通过跨学科的尝试来探讨“问题”，以“地缘”作为切入点来透视民国时期的浙江政局。这里讲的“地缘”，借鉴了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但对其概念的界定则并不完全等同于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中所讲的“地理”，因为“地理”只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本书所述的内容虽然也涉及地理，但它的内涵还不仅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比如蒋介石作为浙江人的因素对浙江政局产生的影响，这就远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所能表达清楚的，因此本书借用了“地缘”一词，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在国内政治地理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

学术界大致有两个学科是专门探讨地理与政治关系问题的，一个是地缘政治学，一个是政治地理学。

地缘政治学是在对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地理上的分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理论，它用地理分析方法来研究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是介于战略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它侧重于国家和民族间关系的全局性问题的研究。^①可见地缘政治学基本上还是属于国际政治学的范畴。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从国际关系中平移到国内，我们也会看到，地缘因素不仅在国际关系中有重要的影响，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地位、战略价值、经济地位，这些因素往往决定着统治者对不同地域的重视程度和统治政策。民国时期，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形式上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而实际上对全国的统治是非常不平衡的，有些地方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强势地带，也有些地方国民党仅仅具有形式上的统治虚名而已。从国民党本身来讲，无论是出于国内政治资源的配置还是出于国防战略的考虑，对不同的区域往往采取的是不同的统治方略，而不同地域的政局对中央政府也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地缘上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产生了一个地缘与政局的关系问题，这可以说是我们从地缘政治学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另一门探讨地理与政治间关系的学科是政治地理学，^②在

① 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本书关于政治地理学的学术史线索主要参考了王恩涌《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中国古代，不但很早就产生了有关政治地理的思想，而且也有对政治地理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研究。公元前 5 世纪前后成书的《禹贡》可以说是第一部区域地理著作，此后历代都有一些地理著作中谈及地域与政治的关系。带有明显政治地理学科特色的著作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地理学家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它从明朝地方志书中辑录有关各地民生利害、政治经济利弊、军事得失等部分，目的在鉴往知来。明末清初的另一位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輿纪要》则被梁启超称为是“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近代以来，国内专门研究政治地理学的著作日渐增多，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学科门类的逐步清晰，从事政治学或地理学的学者出版了数部《政治地理学》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是旨在进行学科边界的界定，有的则是专门性的研究，如吴松弟的《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就对历史上（主要是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地方环境和都城等进行过细致考察。^①至于国外研究政治地理学的学者和成果就更多了，而且还存在着不同的学派，德国的拉采尔（F. Ratzel）与豪斯浩费（K. Haushofer）和瑞典的契伦（Kellen）主张政治地理学就是对国家这个有机体所作的空间研究，正因为如此，这一派被称为政治地理学的“有机组织学派”。

对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在我国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政治地理学的界定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着重分析政治区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文地理学

^① 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的一个分支”^①。王恩涌在其主编的《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则对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作了更为全面的解释，他认为：“尽管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派的主张有所不同，但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地理学的主题。政治地理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过程在地理空间分布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地理空间的改变。这种研究必然集中在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上。因为，人类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而地理区域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场所。所以，人类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区域。”^②

由上可见，政治地理学基本上是介于政治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但是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研讨政治地理问题，将其纳入历史政治地理的视野，现成的研究并不多，以至于历史地理专家周振鹤先生在1998年就提议要加强对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周先生认为，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来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③

探讨地缘与民国时期浙江政局的关系问题，虽然不能完全视作政治地理学研究，但明显具有某种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学术意味，好在当下学术界还是比较推崇“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学科界限”的，因此借鉴政治地理学的有关理论或研究方法也许会另有所获。

① 鲍觉民：《政治地理学》（辞条），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1页。

② 王恩涌等主编：《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③ 周振鹤：《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载《历史地理》第十五辑（1998年版）。

基于以上认识,本课题旨在从政治地理的视角来研讨民国浙江的政局,考察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浙江地方政权的控制和影响程度,提炼出民国浙江政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省份的诸多特点,总结出浙江在国民党政治版图中的特殊地位。

具体而言,本课题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证。

第一,民国时期国家政治中心南移对浙江的影响。根据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政治过程是人们建立或维持一个政治系统中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或措施的时间序列,每一个政治过程都具有一个与其特殊结合的地理区域,每一个地理区域都必然与政治过程有某种联系。^①元明清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度取得了政权后,将中国的政治中心置于南京,但这个局面只持续了很短的时期,稍后,袁世凯再度将国家的政治中心移至北京。直到国民革命时期,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才再一次在南京建立政权,实现了中国政治中心自北向南的迁移,从而导致了国内政治地理格局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对浙江的政局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浙江从一个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边缘省份,变成了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区,中央政府对浙江这个省份的全面控制程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及的(宋代情况特殊,不在此例)。

第二,蒋介石作为浙江人的因素对浙江政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极为重视地缘、血缘及学缘等社会关系的,这些关系往往在政治运作的层面上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蒋介石是浙江人,正是有这层关系,使得国民党政权无论是在建立的过程中,还是在取得政权之后,

① 王恩涌主编:《中国政治地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浙江籍人士都在其中表现出了比较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在这个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虽然蒋介石在当时并没有从主观上以地缘为目标寻找这种政治性的联盟对他的支持，但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结果来看，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的建立过程中，的确是受到了以浙江这个地缘为纽带的政治联盟的支持，换句话说，浙江籍的党政要人在蒋介石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国民党执政后，在其党、政、军、特等各系统中，如果仅从为官者的籍贯来看，浙江籍人士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使浙江在民国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就是强调了这种重要性所在，同时也说明了民国时期浙江在全国的独特性。

第三，国民党强化中心区的统治对浙江产生的影响。国民党统治时期，其政权对于全国的影响力差别很大，在有些省份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但在浙江，却完全不是这样。抗日战争爆发前，浙江省的国民党党组织还是比较健全，党员人数在全国是最多的。根据王奇生先生的统计：1926年，浙江省的国民党党员为3223人，1928年为12143人，1929年为12530人，1931年为12721人，1932年23050人，1933年为21321人，1934年为22791人，1935年为28168人，1936年30385人。^①在1935年和1936年两个年度的统计中，浙江省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均超过了当时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江苏省，居全国第一。这种情况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国民党在浙江的强势统

^①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3年，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252页。